

中国现代美文鉴赏

主编 王富仁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主编 王富仁

中国现代美文鉴赏 (上)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1 号

主 编 王富仁

副主编 钱振纲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卢升淑[韩国]	安昶炫[韩国]
刘殿祥	李 今	李 怡
李夜平	肖同庆	苏勇勋[韩国]
张清华	金井五郎[日本]	金贤贞[韩国]
金济福[韩国]	陈文颖	柳凤九[韩国]
柳顺天[韩国]	孟鸣岐	范志强
荣挺进	胡善顺	姜瑛洒[韩国]
姜静楠	唐利群	贾振勇
崔允瑄[韩国]	郭树竞[韩国]	康莉蓉
谭桂林	魏 建	

中国现代美文鉴赏

王富仁 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33.375 印张 65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01—8000 定价:38.50 元(上下卷)

ISBN 7-202-01814-4/I · 418

《文选》情结与文学的循环系统

(代 序)

王富仁

当前各种选本，特别是散文作品的选本大量出现，并且这类选本一般都要冠以“名作”、“精品”的字样，这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问：“你说这些是名作，其它就不是名作了吗？”“你收到本书的难道都能称得起是名作、精品吗？”有的还指出了其中很多具体的、不可容忍的错误。这种指摘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从古代就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的国家。在那时，所谓文化，就是诗和文。小说和戏剧不登大雅之堂。诗，都是短篇抒情诗，有几篇叙事诗，篇幅也不长。像西方的荷马史诗，像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这类长诗是没有的；文也是这样，《左传》、《史记》都是洋洋洒洒的历史巨著，但它们又是由许多独立的短篇文章组成的，合而成书，分而成文，其它的就更是短文了。西方的“文”可就复杂了，像阿庇安的《罗马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韦尔斯的

《世界通史》都是“史”而不是散文，而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各种学术著作，也不是我们所谓的散文。他们这些作品都主要以独立的著作行于世间，各种选本不是没有任何价值，至少以选家名世的人不像中国这么多。正因为中国古代的诗与文是这么多，又是这么短小，所以选本的重要性就大起来。莫说像贾岛、王之涣这类传世作品不多的作家，就是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伟大的诗人，除了极少数的学者，谁不是通过选本来接触、了解他们的作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选家就有了特殊重要的地位，并且这与文和教的紧密结合又有极大的关系。老百姓是不读屈原的诗、韩愈的文的，读诗和文的是求学的童生，想考举人、中状元的秀才，或者已经成为社会名流的文人学士，他们以文化为尊，要通过读诗文而成为知书识礼的人，成为自己也写诗作文的文人。选本就是他们的教材、范本，通过选本，他们便可以一口吞下全部的精华，在学业上有一个长足的进步。要是选本不精，就等于误人子弟，让人把糟粕当精华，把次品当精品，费力多而收效慢，所以选家要有很高的水平，有为师的资格，不是大家就无权作选家。萧统的《文选》、沈德潜的《古诗源》这些选本本身就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亚于一个著名的创作家的。而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类流行很广的选本，在中国美学思想和

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有类于当代像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游国恩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这些全国统用文学教材的作用，影响到一代代人的文艺观念。正因为选本之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此重要，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形成了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可以用在古代有很大影响的《文选》命名之，称之为《文选》情结。直至三十年代，鲁迅与施蛰存之间还进行过一场有关《庄子》、《文选》的文字之战，可见《文选》的影响是何等重大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选》情结一直贯穿到五、六、七十年代，因为直至那时，各种选本还是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几乎每一套文学史教材都要跟随着一部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选，这种选本是在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按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严格编选出来的。除此之外，像余冠英的《诗经选》、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等一系列选本，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史知识的提高，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选本大量出现，选本的权威性也急剧下降，现在一些学者对选本的不满也就由此而生。这种不满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人们往往忽略了对其原因的探讨，因而这种指摘又不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选本的“滥”，是与当前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的。首先，现在“文”与“教”的分离倾向更加加强了。文

化的普及使社会一般成员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在这个读者群中，欣赏的要求更大于求知的要求。他们之读文学作品，主要不是为了自己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而是为了欣赏。他们也要通过阅读增益自己的知识，但他们不会像学生一样为了掌握一门知识而硬啃那些极难啃懂的东西，他们得首先感兴趣，然后才去读；读了，知识也就有了增益。也就是说，现在的读者群中有两类人，一类以求知为主，一类以欣赏为主，而后者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上获得了迅速发展，其比重大大加强了。求知与欣赏是不同的，求知者重历史的完整性，欣赏者重感受的强烈性。前者讲有用，后者讲有趣。要求知你得对从《诗经》、《楚辞》到王蒙、贾平凹，从荷马史诗到海明威、马尔克思、昆德拉等等中外历史上所有重要作家的作品都要有所了解，你不能只读李商隐而不读杜甫，只读大仲马而不读但丁。但欣赏者就不同了，他可能把巴尔扎克的作品读了一大堆，但连埃斯库洛斯的字也不知道。求知者的阅读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但欣赏者的趣味则是多变的。不论中国的社会思想和审美情趣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对于求知者，《诗经》你是不能不读的，《哈姆雷特》你是不能不读的；对于一个作家，你不能只读屈原的《九歌》而不读他的《离骚》，只读鲁迅的《社戏》而不读他的《阿Q正传》。欣赏者则不同了，他的趣味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少年时喜读武侠小说，成年后他又可能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

品的崇拜者；日子过得顺溜时爱好梁实秋的散文，日子过得不顺溜时又喜欢上了鲁迅的杂文。面对欣赏者这个读者群与面对求知者这个读者群所要求的选本是不一样的。对于求知者，如前所述，选本要精、要严，这里的精和严都是对于相对固定的历史知识而言的，但一到了欣赏者这里，这个精和严就不管用了。他喜欢的就是爱情诗，杜甫再伟大，在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选本中也无法体现出来；他爱读抒情性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入选的可能就远不如拜伦、雪莱和华兹华斯了。对于求知者，你可以十年磨一剑，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一个选本上，并从此名垂千古；但对于欣赏者，莫说你十年磨一剑，就是你略一迟延，他的兴趣早已过去，你再拿出来就没有人要看了。1989年要出的书，到1990年就读者寥寥了。这个读者群的变化又与文化流通市场的变化相应和。在八十年代，出版业由官化向商化转变。不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有多少怨言，但这个发展趋势却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能左右的。在过去，出版业是政治的一环，不论它盈利还是赔本，只要他出的书是政治领导机关认可的“好书”，它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但现在出版业已成为营业单位，金钱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提到的词成了出版业的生命基础。最近我在报纸上看了一篇文章，说是现在严肃文学的冷落是因为知识分子不买书，说只要全国的知识分子每人买一本，就能发行多少万册，能够使严肃读物占领市场。中国搞文的向来不注

重数学，我看这就是一例。他竟没有看到，中国文科的知识分子恰恰是靠卖文为生的，他们也买书，但买书是为了出书，他们的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持他们的生活，他们买书的钱是从卖文的钱之中支付的，所以他们从出版业那里获得的要多于投入出版业的，多于买书的钱，出版业无法单靠中国知识分子自己而获得自己的经济基础。出版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主要从以欣赏为主的读者群中获得经济利润，没有他们，就没有出版业的生命，你想从出版业那里吸取的那点经济露水也无从得到。出版业的这个变化，使他们主要以欣赏者的要求而出版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适应教学需要的高质量选本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更多的还是适应市场需要的选本。两者同时存在，后者多于前者，鱼龙混杂，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些受不了了。

受不了是一回事儿，文化的转变又是一回事儿。在中国古代，文学只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业，我称它为文学的内循环。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它重新创造了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文学的接受者，他们之接受它是为了自己也能写诗作文，让后来的知识分子去接受。这种文学的内循环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它是文学事业自我传承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内循环过程，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才能代代相传。但文学不能只有这种内循环过程，它还有一种外循环。通过这种外循环过程，文学事业才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的事业，文学事业才

能在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中既作用于社会、社会思想、社会审美意识的发展，也从社会中获得自己不断发展变化的动力。所谓文学的外循环，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仅要被其他的文学创作者和要成为文学创作者的人所接受、所欣赏，还要被更广大的非文学创作者和根本不想自己也成为文学创作者的人所接受、所欣赏。一个造罐子的人只是为了另一些造罐子的人或想造罐子的人而造罐子，它的社会意义就很小很小了，充其量它们只能成为展览品，并且是自展自看。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这种自展自看的展览品，不论是标榜载道的，还是标榜言志的，都越来越局限于文学的内循环过程中。中国自古都是一个文化国，都是一个诗国，这是事实，但中国至今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是一个文盲的比例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也是一个事实。这两个事实是怎样统一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都还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业，与整个社会没有多么大的联系。文学是发达的，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人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文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雅文学自身也没有从整个社会人生的变化中获得不断更新的力量，倒是俗文学（当时的戏剧和小说）在不受重视的条件下却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发展。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就主要活动在文学的外循环过程中。

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在读书时就是为了当一个小小说家或戏剧家，而是后来中不了状元，当不了官，或当了官而有私好，才去写小说、编杂剧，它的缺点是无法从文学的内循环中获得持久的营养而主要在下层知识分子的文化基础上自然发展。“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大功绩就是把文学的内循环过程和外循环过程结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学循环系统。但由于中国文化普及程度的有限性，以及五十年代以后出版业的官化发展，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循环系统一直是异常疲弱的。八十年代随着出版业商化过程的发展，中国文学的外循环系统在波动中得到了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看待各种文学的选本，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选》情结的本身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选本的固定性形成的是社会文学观念发展的缓慢性，选本的统一性形成的是社会文学观念的单一化。在三十年代，鲁迅为什么反对施蛰存重新提倡读《庄子》和《文选》，并非说《庄子》、《文选》不可读，也并非说《文选》在它的基础上选得不精不细，而是说书籍的权威性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目的、不同爱好的人应是各不相同的，笼统地为社会或青年选定必读书，就等于把一种思想、一种美学风格当作一种权威性的思想和美学风格强加于社会或青年。选本也是这样。任何的选本，都是别人嚼过的馍，它是选家思想情趣和审美理想的体现，是受当时社会思想和审美理想的制约的。在一种倾向上的选本，不论它选得多精多细，在另一种倾向上应该突出

的作品都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臧克家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他在五十年代编选了一部《中国新诗选》；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又编选了一部《中国新诗萃》。这两部选集都不可谓不精，但读者却可以看到，二者的差别是极大的，这种差别是由于标准不同、审美感受不同带来的。在文学的内循环中，选本所需要的权威性，在文学的外循环中是极难形成的，它是随着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而用新的取代旧的，并且同时就会有各种不同的选本，适应各种不同的读者。差异性使任何一个选本都不可能成为具有绝对权威性的选本，但在这差异中又体现着社会思想和审美情趣的差异和变化，适应教学需要的相对稳定的选本还会存在，但其权威性的地位也会相对降低。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过于看重选本和选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完全精严的选本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要求一个选本也是不合理的。至于那些“精品”、“名作”等字样只不过是出版家的策略行为，是他们为出版物做的必要的包装，你总不能给自己的选本起一个对读者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名字。现在的问题不是出版家不愿出高层次的书，而是从“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一直处在文学的内循环与外循环系统的对接过程中。直至现在，广大农民群众还没有进入文学的接受者的队伍中去，广大的政治管理人员不是以欣赏的态度对待文学，而是以文学的指导者和管理者的身分对待文学和文学作家，甚至一些高层的

知识分子，也以文学的评判者的身分俯视文学，并不把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欣赏品，这就使中国的文学的欣赏者主要由城市知识青年和中青年工人组成，这个文学欣赏者阶层有其特定的欣赏趣味和欣赏水平，出版家不能不受其制约，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又不能不受出版业并间接受这个欣赏队伍的制约。但中国文学要发展，也只能依靠这一基础，只有这个欣赏者群体拓宽了、壮大了，他们的欣赏趣味提高了，中国严肃文学才会有自己更广大的市场，各种文学选本的质量才会有所提高。但无论怎样提高，以一个选本定天下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了。

我说以上这番话的目的，无非是说读者不要以权威性选本的标准要求我们这本中国现代散文的选集。我们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但对中国现代散文没有下过专门的研究功夫，也不是为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教学而编选这本书的。我们是面对当前的欣赏者的，我们觉得这些中国现代散文是可以一读的，就把它选了进来。我们只保证这些入选作品的可读的价值，并不保证凡是可读的都选入了本书，甚至也不能保证没有入选的都是比入选的更差的作品。自然不是为了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教学，所以我们也不想为中国现代散文家排座次，有的作家选得多一些，有的作家选得少一些，甚至有的作家，包括非常有名的作家的作品没有选，这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对于具体作品就更是如此。为什么选了这一篇而没

有选那一篇，除了我们不是在读完全部中国现代散文作品而后逐一比较的无知的因素之外，其它一些极偶然的因素也是起很大作用的。举个例子来说，周作人的《谈酒》是中国现代散文选本常选的一篇，但我没有选它。我是喝酒的，并且每喝都要喝得有些醉意，我认为喝酒就是追求的那点朦胧的醉意，不为那点醉意，大可不必喝酒，而周作人的观点则与我不同，我就没有选它。但他的《初恋》则是我早年就读过而至今记忆犹新的，虽然它不如《谈酒》更常被人选用，我还是选了它。这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个人的爱好总使一个选本没法做到绝对客观。那么，它就完全体现编者的审美观念了吗？也不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散文名篇，尽管我们自己的感受有些不同，也还是保留了下来。例如茅盾的《白杨礼赞》，是每一个中学毕业生都熟悉的散文作品。仅从我的感受，它的情感不是内在的，“白杨”这个意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它既不如高尔基的《海燕》那么情意真切，也不如丰子恺的《白鹅》那么朴素平实，作为精品是比较勉强的。但它太有名了，读了我们这本散文选本的读者还不知道茅盾的《白杨礼赞》，恐怕要受到周围人的耻笑，因而我们还是把它选入了。但有时又有另一种情况。同样有名的夏衍的《包身工》我们则没有选入，这既因为我们不以报告文学为主，也因为文章中的现象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又大量出现了，这说明包身工这种社会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

剖视该种社会现象的观点，其局限性已经太明显了，这会影响读者对它的感受。考虑再三，我们还是没有选它。我们既不能全选人人都已读过的作品，又不能选人人都未必读、不想读的作品，所以要挑它的毛病是极容易的。我们所能达到的只有一个极其有限的目标，即读者读了这本书，一定会比不读时有一些提高，对中国现代散文多了而不是少了一些了解。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其它的奢望我们是不敢有的。至于欣赏文字，更不能将其作为教材看，欣赏是主观性更强的一种精神活动，它只是给读者一个引发，打开读者自己的思路，读者对一个作品如何看待，还要以他自己的具体感受为准，是不必受这些欣赏文字的限制的。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现代文学也渐渐成了世界性的，该书我们约请了部分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外国留学生撰写了部分作品的欣赏文字，这是一个尝试。他们的缺点是不能更自由地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但他们又往往能发中国知识分子所未发，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例如金井五郎先生对陈西滢《日本汤屋》的赏析，就是中国人自己所作不出来的。

本书是应河北人民出版社之约编写的，该社的李方小姐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更加多的劳动，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1995年2月2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例 言

一、本书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选集，重点选收抒情、叙事性的散文名篇，兼及其它。我们以有助于读者欣赏能力和散文写作能力的提高为基本目标，在题材范围上尽量做到广泛，在手法上尽量做到多样，在人生观念和思想视角上尽量做到兼收并蓄，以使读者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和帮助。

二、本书共收入 67 位中国现代散文名家的名作 127 篇。作品的排列以作家的生年为序，同年诞生的则以逝世年的先后为序，同一个作家的作品除少量以作品集出版的顺序为准之外，均以发表的先后为序。

三、本书每篇美文之后附一篇赏析文字。这些文字是提示性的，以展开读者自己的思路和联想为主要目的，而不是解读性的，所以它们不拘一格，各有偏重，不求统一。

四、在撰稿人中，我们除邀请了部分国内著名的中青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外，还

约请了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将带给读者以异域的文化感受和崭新的思考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深广，中外学子共同对中国现代散文作品进行赏析，是本书鉴赏作品的一大特色。